



三進相連「三棟屋」 四人合力「四必堂」

FUN享歷史

逢星期五見報

三棟屋村十四世祖陳任盛(1725-1781)跟隨伯父來港初期，於峇下老屋場山邊務農為生。陳任盛去世後，其長子十五世祖陳健常(1761-1840)承繼家業，家聲大振，並買得風水寶地，建立三棟屋村。(即今天的三棟屋博物館)

該地在堪輿學上稱為「海棠春睡」(Sleeping Beauty)，美人的頭部就在今天的老圍，建村處在美人的大腿上，而三棟屋坐向256°靠西的位置，面迎汲水門、背靠名為獅地的小山、左為青衣群山、右為上下花山。門前水道，每當春、秋日落之際，千道金光映照屋內。這解釋了為何荃灣眾多客家村落中，只有三棟屋及楊屋村是面向西方的，而其他村落均是向南的原因。因為根據《易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坐北向南」是傳統的好風水方向。

購入村地後，陳健常帶領全族村民於農耕之餘，全力投入，經年才將該處削平成高地建屋。陳氏族人以石灰、黏土、禾稈草等材料建成牆壁厚16吋的房屋。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村落建成，陳氏宗族擇吉搬入。

三棟屋為客家堂屋與斗廊屋混合建築，其建築空間體現了一種尊卑、長幼有序的倫理關係，當中以陳氏宗祠為主軸，設前、中、後三個廳堂，族譜分別稱之為「前殿」、「中殿」、「後殿(神殿)」，三殿之間共設有兩個天井。各殿兩側均設有斗廊屋，供陳健常四兄弟及其後人居住。宗祠與斗廊屋建築相連，形成三進兩天井的格局。

由於堂屋群最初建成時，是三進相連的，故名「三棟屋」。而由於村落建築是集合健常兄弟四人之力才建成，故宗祠名曰「四必堂」。

其後，隨著陳氏子孫繁衍，於是在原有的堂屋加建左右兩排橫屋及在宗祠後加建第四進房屋。新加建的三十多間房屋，仍維持原有對稱方矩的特色，全部面向中軸，圍繞宗祠，與原有的建築有小巷相隔。而加建的房屋於十九世紀末期完成，自此，這42間房舍，形成一個162呎多×125呎多，面積約二千平方米，三堂兩橫式的堂屋群，而堂屋群內設五小巷(三橫二直)，這與荃灣一般村落的前後橫排式布局不同。由於堂屋群內已缺乏空間，即使子孫繼續繁衍，陳氏族人亦沒有再在堂屋群內加建，而改在堂屋群外的村落範圍。

陳氏宗祠門上有一石楣，刻着「陳氏家祠」四字，屋頂為傳統的金字瓦頂，整個結構主要以木樑架和山牆支撐。而宗祠及後來加建的房舍，牆身均鋪有花崗



◆由於堂屋群建成時三進相連，故命名為三棟屋。圖為三棟屋模型。

資料圖片

岩(麻石)，這是家境富裕者特有的，顯示陳氏在當時已擺脫了到港初期的貧困境況。

另外，三棟屋的各房舍均緊緊相連，大多共用牆壁，主要原因有三：在不安穩的時勢(海盜為患)提供互相保護、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及配合風水上的考

慮。而三棟屋的房舍亦與當時其他村落的房舍一樣，外牆並沒有窗。此外，三棟屋宗祠入口對聯上方設有兩個瞭望洞，用以防範山賊或海盜。

今天我們參觀三棟屋博物館，是否仍能體會到建村者的用心良苦呢？

◆ 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簡史》。)

朱元璋清除功臣 為乖孫繼位鋪路

歷史今昔

逢星期五見報

之前看到旁邊的專欄在寫朱元璋，看得手癢，也來寫一下。不過不是說他的樣子有多奇怪，而是說他那屠殺大臣的喜好。

朱元璋白手興家，從小和尚變成大皇帝，身邊自然有不少功臣替他打天下，但這些功臣大部分都沒有什麼好下場，隨便數一數，李善長被指縱容謀反，賜死；胡惟庸被疑叛亂，處死；宋濂受胡惟庸牽連，謫死蜀地；藍玉被指謀反，凌遲；傅友德被指不敬，自殺；馮勝被指私理兵器，自殺。

簡簡單單已數出那麼多功臣死於非命，這在歷朝歷代都不常見。如果只是一個兩個的話，那還容易解釋，但殺死那麼多功臣，到底朱元璋在想什麼呢？這問題困擾了歷史學家多年，直至現在也沒有一個大家都認同的看法。不過，還是有一個看法比較主流，那就是繼承問題。

朱元璋長子朱標，本來是公認的太子，地位穩固，雖然跟朱元璋關係不見得非常親密，但溫文儒雅，深得朱元璋和眾大臣信任。這本來一切都好好的，但朱標卻在洪武二十五年病逝，繼承人位置出缺，這就給朱元璋一個大難題。

大家都知道，朱元璋就非常喜歡四子朱棣，也就是日後的明成祖，但朱棣前面還有兩個哥哥，傳給四子不傳給他們，於理不合，最後只得由嫡孫繼承，也就是朱標的長子朱允炆，即日後的建文帝。

無奈的是，朱允炆還年輕，而朱元璋卻年紀漸大，不得不考慮自己身後之事，所以朱元璋就開始為權力交接作準備，思考有哪些人可以留給乖孫，又有哪些人需要自己先行處置，免得乖孫被人欺負。

經過評估之後，朱元璋決定對自己的功臣班底來一場大整肅，文官如李善長，武將如藍玉，全部在整肅之列，就是怕朱允炆沒辦法駕馭這一班人，所以殺的殺，貶的貶。

熟悉明朝歷史的讀者，就會留意到不是所有功臣派系都在整肅之列，朱元璋故意手下留情了一點，幫助朱允炆施政，例如靖難之役中統率明朝軍隊主力的耿炳文，以及徐達長子徐輝祖等。

在朱元璋看來，朱允炆登位後，最大的問題會來自功臣集團，而自己先替他清除不安因素，再加上朱家子孫，也就是朱允炆的叔伯們鎮守邊疆，再留些好控制的大臣給朱允炆，這朱家江山就穩了。

當然，人算不如天算，我們都知道，最後把朱允炆逼得走頭無路的，並不是朱元璋最擔心的功臣集團，而是他非常喜歡的四子朱棣，而他留下的大將耿炳文和徐輝祖，的確都盡力去幫朱允炆守住江山，可惜朱允炆有眼無珠，竟然跑去任用李景隆，這才把皇位送了給叔父。

這個就是歷史學界現時較為多人認同的原因。當然，我們沒辦法確定朱元璋當時到底是怎樣想，也許他真的只是失心瘋，看誰不順眼就把誰殺掉，但從歷史記載中分析，這個為孫兒清除障礙的論點，算是最合理的了。

◆ 布安東(歷史系博士，興趣遊走於中西歷史文化及古典音樂。)

新界北地勢平坦 雨水積聚難退走

氣象萬千

逢星期五見報

雖然暴雨可在全年任何時候於本港出現，但主要都在夏季發生，香港全年雨量接近八成在五月至九月間錄得。

有幾個符號在雨季經常出現，分別是雷暴警告，提醒市民香港可能受到雷暴影響；黃色、紅色、黑色暴雨警告，提醒市民暴雨現在或將會影響香港，可能會造成嚴重混亂；山泥傾瀉警告，提醒大家大雨可能引致山泥傾瀉。還有個符號，寫着一個「北」字，大家知不知道這個符號是代表什麼呢？

其實這個符號是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當降雨量超過天然或人造排水系統的負荷時，積聚地面的雨水便不能及時排走，引致水浸。市區水浸通常都比較短暫，但新界北部由於有較廣闊的集水區和地勢平坦，雨水積聚和水退都較緩慢，因此水浸時間可能比較長。

天文台於1998年設立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提醒相關市民注意，大雨可能引致新界北部出現水浸，要做好預防措施。報告適用的範圍包括元朗、錦田、八鄉、新田、牛潭尾、上水、打鼓嶺、沙頭角等地。

此外，這項特別報告對農民、魚塘負責人及其他



◆香港的暴雨主要在夏季發生。 影片截圖

因水浸而引致損失的人士有預警作用，並提醒有關政府部門及機構採取相應行動，例如準備搜索和救援工作、開放臨時庇護所、部分學校可能需要停課。

新界北部水浸報告會在有必要時發出，無論當時是否已經發出其他惡劣天氣的警告，如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和暴雨警告信號，若果局部地區大雨在新界北部以外出現，天文台就會發出局部地區大雨報告提醒市民。

當大雨或雷暴發生時，如果大家想知多些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局部地區大雨報告或雷暴警告正影響什麼區域，可以參考大雨及雷暴區域資訊網頁。



◆香港天文台(本欄以天文台的網上氣象節目《氣象冷知識》向讀者簡介有趣的氣象現象。詳情可瀏覽天文台YouTube專頁：<https://www.youtube.com/user/hkweather>。)



羅振玉兩救珍寶 麻袋內藏清檔案

輕鬆讀中史

隔星期五見報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年僅三歲的愛新覺羅·溥儀即帝位，其父醇親王載灃任監國攝政王。載灃要查閱清初多爾袞攝政典禮的舊檔，內閣官員檢之不得，便藉口宮中大庫積存的明清檔案無用者太多，竟奏請焚毀，並得批准。當時張之洞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務，奏請將大庫檔案交學部處理，後派學部參事羅振玉到大庫察看。

羅氏到大庫後，「見庭中堆積紅本兩束，高若丘阜，皆依年月順序，結束整齊。」他隨手抽出兩束，見其中一束為乾隆時漕運總督管干珍督漕時的奏摺，另一束為乾隆時軍機大臣阿文成征金川時的奏摺，兩者日月銜接，具有次第，「詢何以積庭中，始知即奏請焚毀物也，私意此皆重要史稿，不應毀棄。」於是懇請張之洞上奏罷焚，結果這批本應要焚毀的明清檔案得以移存位於國子監的學部圖書館內。

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教育部接管了清學部所存的明清檔案。1913年，北洋政府在國子監舊址，設立了歷史博物館籌備處。1916年，籌備處遷往故宮午門，於是將原存國子監的明清檔案一併遷到午門和端門門洞中，入袋存放。1921年，北洋軍閥混戰，北洋政府財政困難，各部門往往不能按時發薪，於是教育部竟將存放在端門門洞中約八千麻袋，重約十五萬斤的明清檔案，以四千元之數賣給北京西單同懋增紙店，作為再造紙原料。同懋增紙店買得檔案後，分送定興、唐山兩地紙坊。

1922年2月，羅振玉因事至北京，於琉璃廠購得

明末洪承疇拜見皇太極的揭帖，認定是內閣大庫之物，遂多方打聽，得知教育部歷史博物館出賣大庫檔案之事，羅當即往同懋增紙店。此時，大庫檔案已經運出半數，羅振玉以12,000元，即三倍的於原價將原物購回，把已運往定興的運回北京。而把運往唐山的則運回羅氏的居處天津，羅振玉更特闢庫書樓藏之。羅氏先後兩次挽救大庫檔案，實在功不可沒。這次明清檔案失而復得的經過，史稱為「八千麻袋事件」。

羅振玉購得這批檔案後，做了一些初步整理工作，編印了《史料叢刊初編》十冊。卻只是檢理不到「千百之一二」，深感「此事竟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加以時局動盪，最後中止了整理工作。

1924年，羅振玉除了自留部分外，其餘全數以16,000元的價錢賣給寓居於天津的清朝遺老、當代著名收藏家李盛鐸。李氏所藏宋元以來珍本書籍及敦煌卷子極富。不過如此巨量的檔案，很難處置。因此，李氏只檢視了其中一兩袋，其餘再沒有翻動。這時適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經與李氏接洽，以18,000元購回。自此，大庫檔案輾轉播遷，數易其主，最終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購得。其時整批檔案重約十二餘萬斤，較原來的損失約二萬多斤。

1929年5月，史語所由廣州遷回北京，立即將其所收購的明清檔案集中在歷史博物館午門西翼樓上。整理工作從1929年9月開始，到1932年底基本結束。新中國成立後，明清檔案的整理工作歸第一歷史檔案館籌辦。至今絕大部分檔案已經上架，並有簡明的目錄可查，以供研究者使用。

◆羅永生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中國歷史教學及研究中心主任

水墨大展

星期五見報

作者：趙澄裏

畫作：歲月如聲圖

簡介：在潮汕民間，夏日家中庭院總有一缸花繁葉茂的荷花，清芬蕩漾，荷風清涼，令人賞心怡情，暑氣頓消，種荷是潮汕百姓的精神寄託，美好生活的象徵。作品正是表達了上述的意境，描繪的荷花亭亭玉立，器宇軒昂，大紅大綠的色彩和對稱構圖帶來強烈的視覺感受，背景的紅色雕花門和各種綠色植物烘托了氣氛，賦予了歲月如意的內涵。

◆資料提供：

